

多元主体合力与共谋的仪式展演：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之解读

张馨凌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安顺屯堡文化是明朝时从江南随军或经商到滇、黔的军士、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遗存。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 是百年来屯堡村寨和外界, 尤其是与学术界不断交流、碰撞、对话取得的结果。《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是多元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工具和介体, 屯堡人和学者、官与民, 农村社会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等“合力”与“共谋”进行着的新形式的知识生产。

关键词: 仪式展演; 实践; 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 G12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14) 010-0110-04

Joint Forces and Conspiracy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Ritual Performanc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Jichang Contract Documents compilation” Premiere

ZHANG Xinl-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unpu (屯堡) culture is the relics from the southern army or business to Yunnan, Guizhou sergeant, businessmen and their families life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Jichang Contract Documents discovered is tunpu villag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for centuries, particularly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collision, the dialogue of the results with academia. “Jichang (吉昌) Contract Documents compilation” premiere is tools and mediator of multiple subjects dialogue and exchange, and a new 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from the tunpu and academics,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the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joint forces” and “conspiracy”.

Key words: ritual performances; practice; knowledge production

一、引言

“仪式”是人类学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仪式研究, 是人类学者热衷探索的经典话题之一。从19世纪至今, 以“仪式”为对象的研究蔚为大观, 成果与争议并存。这也使研究者意识到, “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 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1]彭兆荣指出, 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 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和结构框架; 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 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序;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表述。^[2] (P10) 据此可以认为, 仪式与社会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即仪式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空间进行的重大实践活动。重大的庆典、祭祀活动均属此范围。

关于仪式的研究, 从涂尔干到特纳, 从强调仪式的“强化功能”, 认为仪式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的秩序, 到认可仪式的协调、整合与心理支持作用。学者们都约而同地认识到仪式在社会实践中的重

收稿日期: 2014-09-11

[作者] 张馨凌 (1979-), 女,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旅游人类学、饮食人类学。

大作用。对此，以色列人类学家唐·汉德尔曼的观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仪式本身是由文化秩序所塑造的，反过来又塑造产生他们的社会秩序”^[3]，仪式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相互型塑的关系。换言之，仪式本身成为一个话语场，与其有关的各方据此交流、对话，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沟通。

一场在发现地举行的一批乡村契约文书汇编出版物的首发仪式，因学者、地方政府、村民、媒体等各方力量的参与和介入，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既具有实践的特质，又具有表演的性质与特征。因而，引起笔者特别关注，作为亲历者，笔者试图展示该仪式多元主体合力与共谋展演，具有对话、交流与交通，并直接作用于生命个体与社会现实的特质。

二、仪式展演：《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

顾名思义，“《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是为《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出版、发行而举行的仪式。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被称为屯堡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其发现地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村。吉昌村，原称石门坎、军粮屯、鸡场屯等，全村900多户4000余人，均为明代“调北征南”由江南入黔的屯堡人家，为贵州屯堡人居第一大寨。2009年，吉昌契约文书发现、收集、整理完毕。《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中所包含的452份契约文书，时间跨度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到1961年（不含附录部分文书的时间），涵盖了二百多年的历史。^[4]

这批屯堡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出版，源于已多年扎根屯堡、研究屯堡的学术团队。2008年，该学术团体在吉昌村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的田野调查。应课题组之邀，村民田应刚、石松林两位老人带来了数十张契约文书。随后又有几位村民愿意提供家藏契约文书。鉴于这批文书的珍贵性，课题组向所属大学报告，获得立项批准，收集契约文书的工作顺利进行。课题组采取翻拍与录入同步进行的方式，并特意邀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人在旁协助，以便准确录入，发现问题及时请教，现场解决。在统计归类的基础上，课题组三次到吉昌做专题性现场调查和考察，在田应宽等二十多位老人的帮助下，完成地图所需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勘查、确认、指认工作，经专业人员的再研究，绘制出《吉昌屯科田秋田分布示意图》一份。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于2010年7月举行。当天，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吉昌村村民们衣着亮丽，尤其是妇女们穿着屯堡服饰，整齐列于村口欢迎前来参加首发式的学者、官员以及游客。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安顺市政府代表颜学丽，著名学者陆学艺、万明、纳日碧力戈、谢曙光就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及合集出版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效应发表看法。村民则表演了独具特色的地戏和花灯。契约文书持有者吉昌村民田应刚等17人接受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赠书。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吉昌村汪公庙共聚，就地方文献与屯堡历史文化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三、再生产的型塑：《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的意义

从展演的立场看仪式是当代仪式研究的主流。从展演的角度讨论仪式，可进一步探讨这一在特定空间内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再生产”和“再塑造”特性。也就是说，交流与交通构成了仪式的一个基本功能，并通过这一功能作用于社会现实。^{[5] (P43)}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的核心要素是：对话、展演、交流。仪式犹如一次盛大的展演，官与民、屯堡人与学者轮番登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沟通联系。

追溯这场仪式的缘起，《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产生可说是多元主体“知识生产”的典型个案。按学者的初步研究，就学术价值而言，这批民间历史资料的面世，可丰富我国契约文书区域和族群类型的种类；可填补我国屯田制度地权变迁及影响的民间史料的空白；可给予明朝以来西南边地基层社会在文化与经济纠结中如何实现国族整合的相关信息；可为从村落视角透视黔中区域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提供最基层史料。^[6]

从前述学术价值而言，“《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是官与民、屯堡人与学者、地方政府与学术共同体这一多元主体对《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认可并合力推进其研究与应用的结果。这是仪式产生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理由。

知识生产在此呈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多元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参与仪式出于其特定的政治战略，亦即有关城乡发展、政府品牌的树立等考虑。官方须借助仪式这一公共空间充分展示立场和意图，如其发言人所说“首发式的举行对于保护传承文化，打造黔中文化品牌、构建黔中文化谱系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推动安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安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4]

仪式提供了言说的空间,学者与村民在此中观看和聆听。只有充分了解对方意图,方能进行对话与交流。学者代表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就认为吉昌契约文书在当下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过程、土地制度变迁和改革具有重要现实启发意义。正是在共同体认识到吉昌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官方与学者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谋”。

在《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这一个案之中,屯堡人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与学者和官方有着积极互动关系。如果说对于保护或发展吉昌契约文书学者持有的是概念和议题,官方持有的是权力话语的话,那么,屯堡人持有的就是契约文书本身和本土意识。

仪式给屯堡人提供了舞台以表达其诉求与力量。这一诉求借由表演屯堡人独特的地戏和花灯戏呈现出来。屯堡地戏是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传统文化,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同时,也被视为屯堡人的“民族记忆背影”。^[5]另外,据李立所言,地戏是“知识生产互动的起点”。^[6](P34)地戏既是互动起点,自然可成为多元主体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屯堡人带上脸子,穿上戏服,表演传统剧目;屯堡妇女穿上她们的“凤阳汉装”(多以青、蓝、黄色为主,样式为宽袍窄袖并且不加花边),载歌载舞,面对外来者(学者、观众、媒体)表现出屯堡人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村落凝聚力。在此,“仪式”是一个有着象征符号的自在的意义体系,“类似一种情感升华的过程……具有一种促成欲望的功能,它既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同样也可以促使他们去行为”。^[9](P51-52)这样的表演,传递出一个讯息:屯堡人不是“消极”的等待被发现的“他者”,他们也是知识生产共同体的一员,主动介入到具体的知识生产当中,是“知识生产者”之一。借由首发式,在看与被看当中,作为观众的学者、地方官员、媒体、外来人与屯堡人互动,双方进入同一个话语场,围绕着“吉昌契约文书”这一个主题对话。

展演的形式不仅是屯堡人的文化表演,赠书仪式亦是展演。在首发式这实践场中,沟通和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知识或物)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知识生产是多元主体互动的成果,但不是结果。在“合力”与“共谋”之下,它更应该走向的是契约文书的持有者本身。吉昌契约文书来自民间,所拓展出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法人类学、经济—社会史等学科新视域的研究和相关的区域比较研究以及可预见的成果,即知识的再生产成果将有助于屯堡乡民社会未来的发展。

于汪公殿中举行的学术座谈会,可说是在神圣的场所就世俗之事(《吉昌契约文书汇编》)进行的对话和沟通。这一对话和沟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可说是仪式展演的推进和深化。

第一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发生在学者与学者之间。学者们对于作为基层社会的吉昌村社会结构和汪公会在吉昌村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能基本达成共识。学者们指出,汪公会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基层结构,或为族权、政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组织形式。有学者从现代人的实用诉求出发,试图为当下对产权私有化的热烈争论向民间契约文书寻找历史资源内蕴的启示。

学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应该毋庸置疑。但如何研究、怎样研究在座谈会中仍然是颇受关注的问题。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或许会引发关于乡村基层社会的民间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和调用问题,这对学者来说意义何在。有学者认为,做任何研究,文献资料的积累十分重要。吉昌契约文书的发掘开了好头,既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同时还可能提供一些全国性的示范成果。也有学者认为,契约文书再辅以口述材料,在作为研究资料时仍嫌单薄,应当查找相应的档案资料进行印证。

第二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发生在学者与屯堡人之间。契约文书持有者代表和协助发掘契约文书村民对吉昌村历史文化、契约文书保存和发掘的有关细节问题接受与会学者询求。如果说前述仪式上传统文化的表演是屯堡人借“物”(地戏、花灯戏等)表达地方力量的诉求,那么,作为主动的知识生产者,他们欲借“词”这一载体进一步表达期望深入了解本村人过去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契约文书中的价值到底何在、对村民有无帮助等意图。

知识生产之复杂,其中牵涉生产者、生产对象、生产结果等交错的问题。知识的生产并不是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它还事关当事者的利益。对于屯堡人关心的问题,对于文书发现之后的如何保管存放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有学者认为吉昌文书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模式形成强烈反差。黔东南的清水江文书在被文人发现之后,随之遭到绑架式的搜集。吉昌契约文书发现者联合文物保护部门,在吉昌建

立了新的模式，由社区为基础的自我力量为主导进行保管，这种对自我文献遗产的保护，形成相互监督的制度。另有学者则认为应高度警惕隐藏于民间的契约文书一经学者发掘并公开印行发布流通，从而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效应。当地人各家自藏的契约文书一旦公之于众，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产权纠纷，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对此，也有学者指出，当事人具有历史地看待产权变更的认知能力，没必要需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夸大。^[4]

对话和沟通当中，有共识也有争执。学者们深入屯堡村落，体察到屯堡人的力量和诉求。在讨论当中，对吉昌契约文书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有待进一步的肯定。另一方，争执反映了学者应该有的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不局限与被发现的物本身，而是延展到了当下学术研究和地方发展的深度，反思知识生产错综复杂的过程，从而发现问题所在与或可努力的方向。

学者与学者、学者与屯堡人因“《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而聚集并交流。其聚集的结果超越了首发式形式本身。这正如汉德尔曼指出的，仪式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相互型塑的关系。围绕着《吉昌契约文书汇编》进行的交流将形成巨大的能量，参与到屯堡文化当下以及未来的构建之中。

四、结语

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是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一次特别相遇和会晤；其整理、保护和出版，离不开学者与村民、村落与当下大学体制、官与民各主体合力共谋。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呈现了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在形式上，仪式中含着仪式，表演中接续着表演，体现和展示着传统文化和地域价值。在内涵上，首发式是多元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工具和介体，屯堡人和学者、地方政府和大学体制、农村社会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等“合力”与“共谋”进行知识生产的结果。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可说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借助力于官与民、学者与村民、学界与村落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交流的一个范例。对话和协商是有其意义并将产生作用。它既关注屯堡人的生命史和生活智慧，又积极促进社会现实。屯堡人的历史、当下、未来，在这反思与沟通中将得以保存、关注、发展。

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知识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者、官员、屯堡人作为多元主体各有其意图及立场，由此会衍生出诸多的复杂问题，诸如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会产生怎样的指引；学者的研究会否成为理想的模型，而没有关注到现实的传统社区；屯堡人从“被观看者”到“主动参与者”形象的转变，会否影响当地社会秩序的型塑，进而改变文化生态？这些都是值得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 [2]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0.
- [3] 唐·汉德尔曼. 仪式/壮观场面[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3）.
- [4]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guizhou/2010-07-29/content_635006.html.
- [5]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孙兆霞，张 建. 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的长时段型塑——《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初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 [7] http://www.anshun.gov.cn/gov_xxlm/gov_jrkd/2010/7/2010073009172573499.html.
- [8] 李 立. 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9] 维克多·特纳. 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0] 汪青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吉昌契约文书汇编》[DB/OL]. 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902/18018593811.shtml>.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何 必）